

南宋宁波文化史

(下册)

张如安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南宋宁波文化史

(下册)

张如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宁波文化史 / 张如安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308-10754-9

I. ①南…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史—宁波市—南宋 IV. ①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9131 号

南宋宁波文化史

张如安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64

字 数 1081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754-9

定 价 128.00 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概 说	(1)
第一章 经济表现:土狭人稠,四处突围	(11)
第一节 兴修水利,开辟农田	(11)
第二节 “人力勤而地力且尽”的农副业	(20)
第三节 “冒险而渔取”的渔业	(33)
第四节 “执艺而精良”的手工业生产	(39)
第五节 “通货而贸迁”的商品经济	(55)
第二章 儒学思想:派虽不一,皆有心得	(74)
第一节 洛学遗绪,其道未大	(75)
第二节 史浩袁文,堪称先驱	(95)
第三节 淳熙大儒,阐明正学(上)	(106)
第四节 淳熙大儒,阐明正学(下)	(126)
第五节 理宗前朝,陆学余绪	(151)
第六节 晚宋新潮,以朱变陆(上)	(167)
第七节 晚宋新潮,以朱变陆(下)	(185)

第三章 史学成就:旁搜博征,经世致用	(201)
第一节 理宗朝以前的四明史学	(201)
第二节 援经析理,务求其是:黄震的史学成就	(209)
第三节 综罗文献,兼取百家:王应麟的史学成就	(215)
第四节 传教明宗,分灯照世:佛教史学的繁荣	(223)
第五节 地方史志、文献的编修	(234)
第四章 其他学术成就	(243)
第一节 经济思想	(243)
第二节 经学成就	(249)
第三节 语言文字研究	(274)
第五章 文学艺术:群贤蔚起,各出才笔	(284)
第一节 南宋四明文学概说	(284)
第二节 诗歌创作(上)	(290)
第三节 诗歌创作(下)	(323)
第四节 词的创作	(345)
第五节 诗词唱酬的兴盛	(357)
第六节 散文创作	(364)
第七节 小说和戏剧	(403)
第八节 文学批评	(412)
第九节 音乐歌舞	(421)
第十节 绘画艺术	(441)
第十一节 书法艺术	(461)
第十二节 雕塑、园林等	(473)
第六章 教育事业:家诗户书,传学彬彬	(483)
第一节 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体系(上)	(484)
第二节 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体系(下)	(498)
第三节 私学教师群体与尊师风气的形成	(518)
第四节 科举社会的形成	(526)
第五节 丰富多彩的教育思想(上)	(534)

第六节	丰富多彩的教育思想(下)	(556)
第七节	蒙学读物的编写和家训的兴起	(567)
第七章	科技成果:观变察机,多能巧思	(583)
第一节	农学成就	(584)
第二节	生物学成就	(598)
第三节	医药学成就	(618)
第四节	其他科技成就	(635)
第八章	图书事业:渊涵文献,无所不贯	(653)
第一节	藏书事业的勃兴	(653)
第二节	编书和刻书	(668)
第三节	图书学研究	(684)
第四节	四明女性的阅读活动及其意义	(696)
第九章	宗教兴盛:宝地金绳,禅教都会	(709)
第一节	南宋四明佛教兴盛概述	(709)
第二节	曹洞复兴:以正觉、如净为轴心	(720)
第三节	临济当家:以圆悟系为主流	(740)
第四节	台教鼓行:以四明系为中心	(755)
第五节	净土胜缘和律宗衰微	(766)
第六节	四明士人与佛教	(778)
第七节	四明道教与文人的崇道	(797)
第十章	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特色鲜明	(822)
第一节	乡间义风	(822)
第二节	社群文化	(858)
第三节	饮食烹饪	(879)
第四节	花卉之好	(906)
第五节	旅游活动	(917)
第六节	婚丧习俗	(933)
第七节	民间信仰	(946)

第十一章 对外交流:文明传播,盛况空前	(959)
第一节 佛教传承:东海儿孙日转多	(959)
第二节 唐物东渡:四明与日本的其他文化交流	(978)
主要参考文献	(994)
后记	(1005)

第六章 教育事业:家诗户书,传学彬彬

北宋时期,四明文化开始正式形成,形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动力之一便是教育的兴起和扩展,并初步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办学体系。南宋四明文化全面繁荣,人才辈出,更是与教育的繁荣发达密不可分的。乾隆《鄞县志》说:“四明在东南大海之滨,水趋二浃,山凿四窗,势盘灵结,蔚为人文,虽贤哲钟之自天,而莫不成之学。”^①明确指出了四明人文之盛离不开“学”的养成。官学和私学是南宋四明教育的两大支柱,它们的稳步发展伴随着教育的深化,共同构成了推动四明地域文化发展的基础力量。

南宋四明教育的发展持续而稳定,教育的普及率和科举的考入率达到双高,反映出招生规模大和教学水平高,学术研究蔚成风气,社会影响极大。《宝庆四明志》卷1《风俗》云:“孝宗命元子保厘,礼俗日盛,家诗户书,科第取数既多,且间占首选,衣冠文物甲于东南。”同书卷14《奉化县·风俗》:“富家大族皆训子弟以诗书,故其俗以儒素相先,不务骄奢。士之贫者,虽储无担石,而衣冠楚楚,亦不至于垢弊。”又卷18《定海县·风俗》云:定海“土习相承,皆诗书礼义之训”。储国秀《宁海县赋》记云:“乡贡之家,比比乎连甍,桥门之房,翩翩而结绶。或塞华于童习晚恩,或擢颖于宗英世胄,或文武科之踵升,或内外优之叠奏。”^②显然,良好的教育将四明打造成为以儒素相先的科第之乡。

^① (清)王杰:《鄞县重修学宫记》,见(清)钱大昕等:乾隆《鄞县志》卷5《学校》。

^② (明)崇祯《宁海县志》卷11,明崇祯五年刊本。

第一节 多层次、多渠道的办学体系(上)

南宋四明地区有州学、县学外,其余书院、家塾、舍馆不一而足,弦诵之声,往往相闻。四明至此更加完善了多层次、多渠道的教育网络。从纵向比较,南宋明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制度还是招生数量、教育质量以及学校管理的规范程度,都超越了北宋。如果进行横向的比较,舒璘曾自豪地说:“大抵歛中学校寥落,非吾乡比。”^①邓文原也称南宋时“浙水东四明学舍居天下二”^②,意思是说四明学校名列天下第二。这些不同类型的学校不仅满足了官僚地主阶级子弟对文化教育的渴求,从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普通百姓对文化的渴求,有利于教育向社会下层的发展,促进地域主体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

一、“庠声序音,冠于左浙”的州县官学

宋代的地方官学只有两级,一般每州、县只设一所州学和县学,县以下不设官学,乡镇农村只设私学。宋代地方官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直到庆历年间的兴学运动以后,州县不设学者已经鲜见。但是,由于“靖康之祸”和南宋初年的宋金战争,地方官学遭受劫难,幸存者无几。宋高宗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才下诏重建太学和各地州学,绍兴十八年(1148)又下令重建全国县学,但并未取得良好的成效。整个绍兴年间,大多数的地方官学破败不堪,往往徒有其名。

北宋时四明地区的州、县官学已经齐备,但因建炎之乱,四明地区的州学及一些县学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南宋王朝初步安定之后,四明被毁的州、县学逐渐得到修复、重建,地方官学开始摆脱废滞状态,走上了恢复的道路,这从全国范围来看,处于领先地位。先是郡人林暉率先捐钱十万,草创黉宇。绍兴七年(1137),太守仇悆在耆旧、乡老的支持下,完成州学的重修,州学的主体建筑大成殿和明伦堂巍然矗立。在百废俱兴,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明州的州学得以重建,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显示出仇悆

^① (宋)舒璘:《舒文靖公集》卷1《与王大卿》,《四明丛书》本。

^② (清)乾隆《奉化县志》卷12 邓文原《建尊经阁增置学田记》。

等官员以兴学为急务的施政理念。明州以后历任官员如姜师仲、张津、赵伯圭等皆对州学进行过局部的维修和续建。淳熙十三年(1186)，郡守岳甫、领校官周粹中发起较大规模的重修计划，著名士人汪大猷、史弥大“劝激士类，鸠材效功”，收到了很好的成效。特别是“嘉定十二年，邑簿吕康年隘视故址，请于朝，徙展威果废营，拓基十五亩许，工繁费侈，旷历年所”，到宝庆年间，“得胡尚书榘守郡，始克成殿及庑。殿后为养正讲堂，旁翼四斋，廨舍庖湢种具”。^① 可见宝庆年间在胡榘的主持下，州学终于成功完成了易地扩展的工作，于是“黉宇轮奂，遂甲东诸州郡之上”^②。对此，元代的陈旅以颇为艳羡的口气说：“宋在江左百五十载，鸿生巨臣，蔚然出乎句章，其弦诵之舍宜益完且美矣。”^③ 胡榘奠定的州学格局，一直到明代前期都没有大的变化。故嘉靖三十六年(1557)周相所作鄞学记云：“夫是鄞学起荆国(按，即王安石)，铃斋尚书(按，即胡榘)展易成志，故称。今学更定代有之，大抵多尚书之遗。尚书宝庆二年成学，逮今三百五十年有奇，中凡六修，并兹役为七，前四修皆葺尚书之遗。”^④ 周相对胡榘建设州学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南宋四明的州学不但校舍宏伟，而且由于求学者众多，州学不得不大力扩招，故而在籍生徒众多，理宗时期竟然达到数千规模，超过朝廷规定额的十几倍以上。《开庆四明续志·学校》曾自豪地记述说：“世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盖漳以财计之丰裕言，明以舍馆之宏伟言也。巍堂修庑，广序环庐，槐竹森森，气象严整。旧额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后比屋诗礼，冠带如云，春秋鼓箧者率三数千，童卯执经者亦以百计。”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州学的规模空前庞大，真正称得上是“庠声序音，冠于左浙，英俊之域，俊冕所兴，文献盖彬彬矣”^⑤。州学的主体是成人的大学教育，教学内容无非是经学、诗赋、策论等，与各地的官学基本相同，同时明州州学也包含有蒙养层

^① (清)同治《鄞县志》卷9《学校》之周相记。

^②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2，《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8页。

^③ (元)陈旅：《安雅堂集》卷8《庆元路儒学新修庙学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清)同治《鄞县志》卷9《学校》之周相记。

^⑤ (宋)王应麟：《四明文献集》卷1《庆元路重建儒学记》，张晓飞点校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4页。

次的小学教育。^①到了宝庆年间,知州胡榘重修学宫,“是时鄞学新创,规模初具,士率善充郡弟子员。公乃以县庠为小学,未成童而父兄不能教者,召之来,使郡学级以所业课之,扁其室为养正,拨田益其租”^②。州学实行分斋式管理,为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在课程设置上,设有经术、诗赋和策论。四明官员对官学非常重视,如吴潜“加惠序庠,笃意教养,正讲席以阐理学,新仪门以肃宫墙”^③。显然,南宋后期随着理学正统地位的确定,理学大家的经学著作成为法定的地方官学的基本教材。吴潜又出新辑《孔子格言》及御制《存悔斋箴》凡二百余轴,张贴于州学的廊庑之中。

北宋四明除州学之外,各县全部建立了县学,而同期全国各路县学设立的比率仅为44%。^④但北宋四明地区的县学起伏波动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的进展。南宋时四明各县学在北宋的基础上得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教育业绩可圈可点,但前期属于恢复性发展,毁于建炎四年(1130)战火的各县学相继得到重建和恢复,至理宗时期县学开始走向兴盛,其发展的程度从总体上说要远远地超越北宋。鄞县县学毁于建炎四年(1130)战火,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在史弥远的支持下重建,到宝庆二年(1126)完全竣工。因鄞县士子“率喜充郡弟子员”,故宝庆年间鄞县县学定为小学,并创办了专门招收难童的教育形式:“选里之未成童、父兄贫而不能教者,十三岁以上为一等,十二岁以下为一等,岁养二十员。命郡学职二员,各以所业训之。”^⑤这不失为一种创举。慈溪县学,绍兴十二年(1142)县令毕瑛草创殿宇、斋居,淳熙四年(1177)节度推官宋南强摄邑以劝,里士陈公达首倡,次第修建了大成殿等建筑,此后,县令唐仲温、朱堂等都为县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奉化县学至绍兴九年(1139)县令宋彝复建,久又圮,庆元二年(1196)邑士汪汲等创建,首创大成殿,重立先圣先师十哲之像,有仪门两庑,前有墨池,再建“駕说之堂,挟以直庐,傍列诸斋、庖湦、廩廩、器

^① 关于州学中的小学,(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2《学校》记载云:“越二年,林士衡继周董职,又彻新其六斋,创冷斋于稽古堂之西。”下注云:“后改曰养正斋,以处小学诸生。今小学诸生则分隶诸斋矣。”

^② 王荣商:《东钱湖志》卷2“胡墅庙”引清郑世治记。

^③ (宋)梅应发等:《开庆四明续志》卷1,《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8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607页。

^④ 林拓:《文化的地理分析》第二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⑤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12《学校》。按,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第三章误将鄞县的难童教育归为私学。

用毕备，凡为屋四十楹”^①，又辟出射圃，黉宇辉映，始壮旧观，这为奉化县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定海县学原本规模不大，至北宋崇宁中诏天下行三舍法时，才增广为学宫，但在建炎四年（1130）毁于战火。绍兴八年（1138），县令章汝翼改建，此后历任官员相继为县学的完善贡献了力量，经绍定年间陈缵大修之后，气象一新，连士人都“骇所未有”^②。余姚县学，庆元五年（1199）余姚县令施宿在县学建直舍，“市赡田书籍甚备”，并建学亭作为辅助讲学之所。四明的县学同样实行分斋式教学，如鄞县学分为观善、辨志、习说、敬业四斋。嘉定四年（1211）定海县令崔端学在县学创立育英、养贤、升俊、达材四斋，后戴栩又辟小学斋，名为求益。绍定年间，陈缵于四斋之外更立武斋。^③ 慈溪县学有本仁、明义、约礼、崇智四斋。

南宋四明地区的州、县官学不但硬件设施一流，更主要的还是师资上占有优势。官学聘请了不少本地的名儒执教其中，如鄞县孙枝“学以真实为本，教授乡校者十年”^④。奉化戴表元比较早熟，“年十三即加冠入乡校，从里师习词赋”^⑤，这个里师就是戴氏的外家郑一枝，以词赋著名。^⑥ 戴表元在回忆南宋奉化县学的情景时动情地说：“余自龆龀，实尝从父兄居游庠序间，见魁儒巨公，无虑百数，皆修衣冠，隆阀阅，岁时燕毛序坐，谈古今久近文献，亦或雌黄当世人物。孩稚辈立听不倦，归必充然有得。以余之愚，至今犹能缕缕记忆本末如昨日也。每课试，县大夫亲命题，第赏格，慈爱教督如子弟。及以事相见，酬答如客。于时风淳气厚，上下情义周洽，与前所称

^① （宋）楼钥：《攻媿集》卷 54《奉化县学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宋）胡刚中：《重修（定海）学记》，见（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 14。

^③ （宋）胡刚中：《重修（定海）学记》，见（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 14。

^④ （明）凌迪知：《万姓通谱》卷 21《孙枝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⑤ （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 28《戴先生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 5《戴氏剡源张村葬记》云：“祖考府君宽慈朴谨，君子也，于云台府君为同祖兄弟。祖妣郑夫人，聪敏精书计，于乡贡进士讳一枝字善甫为同父妹。云台府君以毛氏《诗》起家，官四方，晚始贵于朝。祖考府君不及卒业，故先考府君学于外家，以外家之学学赋。学成，复以教表元。”又《小方门戴氏居葬记》云：“先祖府君独朴鲁有至性，兄弟间以房院拥隘，群议出婿于郑夫人。夫人善父先生讳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词赋教授里中，有重名，乡举十四人，时预其高选。郑夫人督警又严，甥孙缘外家故，始皆改用词赋业。”按，戴氏所云“祖考府君”即祖父汝明，出为郑氏婿，郑一枝（善甫、善父）乃郑夫人的哥哥，以词赋教授乡校。“先考府君”指父亲戴灝，从学于舅舅郑一枝。

古俗，殊为未远。”^①由此可见，官学能得到县官的直接关怀，其拥有的齐全而雄厚的师资力量，往往是一般的民间私学所难以比拟的。

官学以选送人才、考取科举功名为最重要的追求目标，集中了大量优秀的学生。北宋时明州“旧无贡院，士亦不过数百，率寓试于行衡，又于府学西妙音院”，南宋参加科举考试的四明士子“试者日众”，遂于乾道五年（1169）在妙音院废地创建贡院，东西重廊凡一百四十楹。^② 嘉定七年（1214），叶秀发在《四明修学记》中说：“方今养士之盛，由太学而下，无过是邦，道学著闻，人才间出。”^③可以说，发达的教育对于四明人才的鼎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史弥远的独相则进一步扩大了四明人士进入仕途的优势。若从县级进士数观察，奉化可谓后来居上。元人邓文原说：“浙水东四明学舍居天下二，而属治文风之盛，必以奉川为称首。”^④说的就是咸淳以来奉化地方官学的盛况。余姚县学的教学成绩同样斐然，据光绪《余姚县志》统计，自宋开国（960）至皇祐四年（1052）的92年间，余姚没有出过一名进士，皇祐五年至北宋末共73年，余姚有进士11名，乡贡8名，南宋余姚进士竟达104名，制科6名，乡贡19名，状元1名，总人数比北宋增加了7倍。^⑤可见余姚县学以南宋为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科举人才，“登名天府，常盛于越之诸邑，及赐第天子之廷，又盛于浙之诸邑”^⑥，以至于袁肅、王佖均自豪地将进士之名题石于学宫。

四明地区的官学不唯管理制度严格，而且办学经费充足稳定，其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划拨，包括田地、实物、货币等形式。其中以政府划拨和私人捐助而形成的学田为官学经费的基本来源，如定海县学嘉定十二年（1219）县令赵珌夫“相继拔官产以俾学租，旧租之湮没者核实而附于石，养

^①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卷1《奉化州学兴筑记》，《戴表元集》，李军、辛梦霞校点，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②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2《贡举》，《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7册，杭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8页。

^③ （清）高宇泰：《敬止录》卷15，《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8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16页。

^④ （清）乾隆《奉化县志》卷12 邓文原《建尊经阁增置学田记》。

^⑤ 季学原主编：《姚江文化史》第二编第三章第五节（由本人执笔），宁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⑥ （宋）王佖《余姚县进士题名续记》，见《光绪余姚县志》卷16《金石上》。

士始仅足矣”^①。可见定海县学办学经费的构成主要是官产加学租，这已足以养士了。从现有的材料看，南宋四明官员对于官办学校的经济投入，除了斋舍等建筑经费外，主要还是学田。元学正杜世学曾说：“四明郡学在昔甲于浙左，田谷充裕，佐以海租，土游其中，恃有所养，得以安心术业，岂小补而已！洋山岙隶昌国州，山七百余亩，地四十九亩三十八步，海滨涨涂不可亩计，宋咸淳间，有司给以赡学，籍可考也。”^②奉化学田旧额四百石，嘉定年间县令冯多福以学廩不足，出家资为倡，集八乡父兄出田，或资或买，增至租入七百石有奇，别为义庄廩，^③“俾群居者无宿舂而乐鼓篋焉”^④。只是后来伴随着学校的衰落，廩蓄也被乡豪学职以所谓周济贫老婚丧为名，“暗图窃取”^⑤。再看余姚县学，邵晋涵《南江文钞·学校官田考》曾说：“我邑学校之有田也自宋始。旧志学故有土田、山林、陂塘，凡八顷有奇。宋乾道四年，前县尉史浩为丞相守越，市良田，收其岁入，以给乡贤之后贫不能为丧葬婚嫁者附于学，谓之义田。庆元五年冬，令施宿亦市田养土。”^⑥据此可知，北宋时余姚学校即使有学田，也是微乎其微。直到史浩镇越，捐帑创置，有会稽、山阴、余姚三县共湖水田 2071 亩有奇，地 36 亩有奇，山筱地 116 亩有奇，浜冈 64 亩有奇，荡 1 亩 2 角 51 步，屋 16 间。庆元五年冬，县令施宿亦市田养士。史浩和施宿都是以官府市田的方式来赡学养士。^⑦除学田外，还有学生缴纳的学费、社会捐资和学校自筹资金（如象山县学刻印《汉隽》一书，获利甚丰）等。总之办学经费来源多途，足以保证官学的日常运行。

^① (宋)罗浚等：《宝庆四明志》卷 18，《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 8 册，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99 页。

^② 章国庆：《天一阁明州碑林集录》之《元代·庆元儒学洋山砂岸复业公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8 页。

^③ (元)袁桷：《延祐四明志》卷 14，《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 9 册，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97 页。

^④ (元)至正《四明续志》卷 7 邓文原《奉化州儒学记》，《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 10 册，杭州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622 页。

^⑤ (清)乾隆《奉化县志》卷 12 邓文原《建尊经阁增置学田记》。

^⑥ (清)邵晋涵：《南江文钞》卷 8，《续修四库全书》本。

^⑦ (清)《光绪余姚县志》卷 10《学校》。

二、道义相与、德性是尊的讲舍、书院教学

自北宋中期以来，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自诗赋转向儒学，带来了士人重视经义学习的风气。儒家学者纷纷授徒讲学，但长期以来经义并没有统一于一家，所以未能形成官学主导士人教育的局面。尽管南宋四明的官学发展很快，但官学远远满足不了士人求学的需要，这就为私学赢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讲舍和书院大多是由理学人士所创立的一种私学教育形式，也是四明学术思想形成、发展和传承的主要场所。讲舍的讲学一般在学派形成之时，学者自由讲学，师友切磋论辩，学生来去自由。学派形成之后，则主要用书院的形式传承不绝，教有名师，学有基地。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教学活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南渡后官学可容纳的学子数量有限，无法满足广大士子求学、应考的要求，因而刺激了书院的发展。南宋可谓是我国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书院总数达到 500 所以上，其中以江西最为发达，有书院 147 所，浙江有书院 82 所，^①数量之多居于全国第二位。四明的书院为数不少，仅以“书院”为名的就有 10 余所。

书院绝大多数由私人创办，也有少数是由有识见的官员创办的。如沿海制置使刘黻认为：“学校不兴，则礼义不明，礼义不明，则人心纵恣，乱之所由阶也。故拨乱致治，其机必由学乎。”^②咸淳七年（1271），刘黻会同邑人何林在余姚客星山严子陵墓左创办高节书院，派遣山长。这就是所谓“官学书院化”现象，有助于官学走出长期以来自我封闭化的格局，进一步实现与民间教育的融合。四明书院的规模大小不等，像余姚的高节书院可容生徒 200 余员。书院一般都有学田，充奉祀养士之需，如高节书院有院田 180 亩。书院还有大量藏书可供阅读，有的书院还刊印书籍。

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讲学为指归。关于这一点，朱熹曾清楚地表述为：“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③袁甫

^① 徐明德等：《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3 期。

^② （宋）刘黻：《高节书院记》，见（清）光绪《余姚县志》卷 10。按，丁治民点校本《刘黻集》（《温州文献丛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年版）未收此文。

^③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 10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也说：“书院之建，为明道也。”^①全祖望也说：“原夫书院之立，将使学者从事于本，先立德而后立言。”^②书院教学形式比起官学来要生动活泼得多，袁燮曾指出：“及庆历兴学之后，虽陋邦小邑亦弦诵相闻，而课其绩效，乃有愧于私淑诸人者。”^③即官学教育的教学效果远不及书院，原因在于书院教育以“道义相与，根于中心之诚”，而官学教育则以“法令从事”，严肃得死气沉沉。^④这是南宋书院异常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 6-1 南宋四明讲舍、书院

名称	所属州县	所在地	创办者	创办时间
高闶讲堂(长春书院)	鄞县	长春门附近	高闶	绍兴中
焦征君讲舍	鄞县	大涵山麓	焦瑗(洛学派)	绍兴中
东湖书院	鄞县	东钱湖畔		淳熙年间
杨文元公书院	鄞县	月湖碧沚	杨简(心学派)	南宋中叶
沈端宪讲舍	鄞县	月湖竹洲	沈煥、沈炳(心学派)、吕祖俭(吕学派)	南宋中叶
城南书院(絜斋书院)	鄞县	月湖竹洲	袁燮(心学派)	南宋中叶
南山书院	定海(今镇海区)	原县治东	沈煥	宋理宗时期赐额
广平书院	奉化		舒璘(心学派)	南宋中叶
楼昉讲舍(迂斋、楼氏精舍)	鄞县	城东三里张斌桥左	楼昉(吕学派)	南宋中后期
甬东书院	鄞县	县东三里独善坊	郑清之(为纪念业师楼昉而建)	宋理宗时期(为宋理宗御赐书额的19所书院之一)
丹山书院	象山	县西一里栖霞观东	赵善晋(县令)	嘉定十一至十五年
菊坡书院	鄞县	县东三十里	陈卓	

① (宋)袁甫：《蒙斋集》卷13《象山书院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6《翁洲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页。

③ (宋)袁燮：《絜斋集》卷10《四明教授厅续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 (宋)袁燮：《絜斋集》卷10《四明教授厅续壁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续 表

名称	所属州县	所在地	创办者	创办时间
陈侍郎讲舍	鄞县	宝幢同谷	陈埙	南宋后期
石坡书院	慈溪	东山(今属江北区慈城镇)		南宋后期
杜洲讲堂	慈溪	鸣鹤乡	童居易	南宋后期
高节书院	余姚	客星山严子陵左	刘黻(沿海制置使)	咸淳七年
慈湖书院(杨文公书院)	慈溪(今属江北区)	慈湖(今属江北区)		咸淳七年
文会堂	余姚	今慈溪之匡堰	高猝	南宋后期
虹桥书院	象山		余天锡	
文津书院	奉化			
登瀛书院	奉化		乡人共建	咸淳年间
广平书院	奉化		舒泌(舒璘之孙)	德祐元年

理学的广泛传播,直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理学名家更加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普遍借用书院进行讲学,在他们的带动下,在宋孝宗以后,各地出现了书院林立的局面。元任士林在《重建文公书院记》中指出:“逮徽国朱文公始复白鹿洞之旧,祀孔子如开元礼,寻创竹林精舍,升曾子、子思以配孔子,以周、程、张、邵、司马、李延平七先生从祀,于是即诸儒讲道之地以立书院者益众。文公既没,凡所居之乡,所任之邦,莫不师尊之,以求讲其学,故书院为尤盛。……其官在郡博士之上,其廪官给之田,或好义而多赀者,请自给。”^①任氏将书院与诸儒的关系,以及书院的讲学内容及其经费来源扼要地作出了说明。四明书院的发展,亦直接受到理学人士的推动。先是在南宋初出现了洛学家的讲舍(堂),如焦瑗在鄞县的大涵山麓有讲舍(相传镇福庵即讲舍遗址^②),弟子颇众。清人全祖望曾寻觅到焦氏讲堂,重为修治。^③高闶的讲堂又名长春书院,他的学问对乡人启迪很大,所以袁燮称赞高闶“以学行之粹,著称于绍兴间。……屏居乡间,士之得于亲炙有所

① (元)任士林:《松乡集》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同治《鄞县志》卷66“镇福庵”条。

③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16《大函焦先生书院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0页。